

# 日本人的战争认识

〔日〕藤原彰 步平译

---

**内容提要** 文章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侵略战争的模糊和错误认识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一般习惯从自己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的经历中理解战争,即站在“被害”的立场上认识战争,而很少意识到战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即缺乏“加害”的责任。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没有向年轻一代正确地传授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从而使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很不充分。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性。文章着重分析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强调了正确认识历史问题的重要性。

**关键词** 战争责任 东京审判 和平运动

---

对于日本人来说,每年的8月15日是战争纪念日。在这一天,举行由政府主持的纪念仪式,新闻媒体进行大量关于战争的报道。虽然此时正值甲子园高中棒球比赛的高潮,但是也要全场停下来默哀,成为夏天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纪念8月15日的意思是悼念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人。这一天,天皇也好,政府也好,都在讲话中对310万牺牲的日本人表示了怀念。可以看出,以8月15日作为战争的纪念日,是从被害者的立场上倾诉国民的感情。于是这一天就被称为“终战纪念日”,意思就是说,由于天皇的“垄断”才结束战争取得了和平。

日本战败的时候,一般的日本人经历了亲人被炸死,房屋成为

废墟,在饥饿和苦难中煎熬的生活,这就造成了他们很强的被害的意识,所以也很容易理解把8月15日作为终战纪念日的意图。他们只觉得苦难的战争好容易结束而可以安心地喘口气了,而没有去想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各国国民。所以日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战争是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的战争,没有认识到日本对朝鲜和亚洲许多国家来说是加害者。日本人没有这样的认识。

17年前的1982年9月18日,也就是在九一八事变51周年之际,我给《朝日新闻》的文化栏写了一篇关于战争纪念日的文章。文章的大意是说,日本人不当只在8月15日悼念战争牺牲者,而应当以对亚洲的15年战争开始的9月18日为纪念日,因为9月18日是日本人作为加害者应当反省的日子。但是,光《朝日新闻》就收到了不知多少反对的文章以至威胁信。好象抗议信也寄给了我所在的大学的校长和文部省。那些人抗议说:“你居然敢说日本是加害者?那是战争,你小子难道不知道吗?还是国立大学的教授呢,简直昏了你的头。”日本人的战争认识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人之所以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的意识,与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彻底有很大关系。与同样是发动侵略战争而战败的德国相比,这一问题表现得很明显。德国的战时体制随着它的失败完全崩溃了,并对战争犯罪进行了彻底的追究。德国国土也被4个联合国成员国分别占领,进行直接的军政管理,从战争的主要责任人到行政机构末端的地方工作人员一律被开除。所以战前的德国完全崩溃,被完全否定了。

与德国相比,日本方面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极不彻底的。对于战争责任者的审判,只限于东京审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为首的政界和财界的领导人没有被追究。虽然也有开除军国主义分子公职的规定,但主要的对象是军人,以官僚为代表的战争中的许多领导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组

织没有受到任何触动。战前和战争中的统治体制,即使在战后也依然存在。

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不彻底,是因为同盟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与对德国的占领政策不同造成的。德国是被4国共同占领,而日本实际上是被美国一国单独占领。另外,德国是在联合国军的直接军政管理之下,而日本则没有宣布军政管理,政府还继续存在,根据占领军的指示实行间接的统治。而美国为了缓和其占领政策,为了在对苏战略上有效地利用日本,则对天皇的权威和日本的统治体制采取了宽容的政策。

1948年东京审判的判决认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并判处了对策划和实行战争有责任的东条英机等人。另外也审判了战争中日本军队犯下的残暴的罪行,其中包括认定了屠杀20万人(著者原文如此——编者)的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惩治了直接的责任者松井石根。由此可见日本的加害责任是明确的。所以在1951年9月于旧金山签订的《对日和平条约》第11条中,有日本接受对战犯审判判决的内容。在缔结和约的时候,日本作为国家是承认了其侵略和加害的事实。

然而,就是在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同时,战犯被先后释放,被解除公职的那些人也陆续回到政界。于是,还在被占领的时期,那些出头露面的政治家和官僚们,就开始提出那一战争不是侵略战争的主张,开始否认加害的事实了。他们的政治性主张就是修改宪法,重新武装日本,即复活日本的军国主义。为到达这一目的,他们必然要竭力肯定和美化战争,拼命把侵略战争的案翻过来。就是在旧金山的和约生效后不久,出现了出版战争记事的热潮,大肆吹嘘那些参谋们和飞行员们的“功勋”,所谓的战争秘闻之类的出版物相当流行。这是在有意识地美化战争。

在这一形势下,保守的政党开始把修宪和重新武装的问题正

式提了出来。但与此同时,拥护和平与宪法的势力也开始了积极的活动:反对美军军事基地运动、禁止原子弹试验运动、和平运动、拥护和平宪法运动,等等。这些运动阻止了修改和平宪法的企图。

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日本国内掀起了反对日本安全保障条约的运动。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反战和平运动是建立在厌恶战争的国民的被害意识上的,这是这一时期运动的特征。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在战争中都有被害的经历:许多家庭有阵亡者,有的家庭成员在原子弹爆炸或空袭中死亡,有的家庭的成员战后吃尽苦头才从海外撤退回来,加上物价飞涨以及饥饿的体验,即使到50年代人们对这些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叙述战争的悲惨是能够引起强烈反响的事情。所以这一时期的和平反战的基础是建立在国民的被害意识上的,而对于亚洲各国的加害意识以及对于加害的反省,应当说是很不充分的。

围绕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国内的舆论分成完全对立的两派,对于重新武装的是是非非,以及对于过去的战争的评价,也有明显的对立。这样的对立以后持续了几十年:日本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还是自卫战争?日本军队在那一战争中有没有残暴的行为?围绕这些问题有许多争论。而且对在东京审判中已经被认定的战争的侵略性质和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也有肯定和否定的不同意见的争论。1965年开始的持续了33年的家永三郎的教科书诉讼,其最大的争论点可以说是关于战争的评价问题。家永三郎先生明确主张:战争是侵略性的,日本军队犯下了残暴的罪行,即日本是加害者。但是这还只是一部分历史研究者的意见,没有被国民广泛地认识和理解。

关于加害的问题在日本社会被提出来,并引起国民广泛的关心,是在进入了90年代之后。其导因来自日本以外,即由国外的战争牺牲者提出赔偿的诉讼引起的。1991年12月,在东京地方法院

进行了关于赔偿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韩国人诉讼。在原告中有3名原“从军慰安妇”很引人注目。接着在第二年(1992年)的1月初,《朝日新闻》对发现日本军队募集和管理从军慰安妇史料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所以在那之后,访问韩国的日本首相宫泽喜一承认了这一事实,并进行谢罪及承诺进行调查。1992年7月6日,宫泽内阁的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就调查结果发表正式讲话,承认从军慰安妇问题与政府有直接关系。

在这次诉讼后,中国、菲律宾、荷兰等国的慰安妇、劳工以及战俘等相继提出诉讼,要求赔偿。其中,除了1998年4月27日由山口地方法院的下关分院就“笑釜诉讼”所作判决判原告部分胜诉外,其余的诉讼都是不予审理或中途停止。另外,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中。这些诉讼许多都得到了市民运动的有组织的支持。市民们通过支持诉讼而联合起来,活动很活跃。所以可以说日本人思考战争加害的问题是由外国的受害者引起的。

进入90年代后,加害问题引起人们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战后50年的问题。1993年8月诞生了细川护熙内阁,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的非自民党内阁,而细川首相也明确指出了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他之所以发表那样的讲话,是因为当时正在就战争的评价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95年的战后50年即将到来,在国会通过什么样的决议有重要的争论。争论问题包括战争的性质、南京大屠杀是否存在、慰安妇是不是强制性的等等。而那时出现了一些观点,如战争是自卫性的,日本是正确的,南京大屠杀是不存在的,从军慰安妇就是“公娼”。这些美化战争论、赞美军国主义论直到今天依然不仅为日本右翼所宣扬,甚至部分政治家和一部分学者、一部分媒体也在大肆鼓吹着。这是近期的特征。

由此可见,国民从加害的角度认识战争的趋势固然是产生了,但是另一方面,美化战争和赞美军国主义的活动也相当活跃。特别

需要注意的是,那些露骨的赞美战争的叫嚣,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的青年一代所接受。

为什么说日本人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是不充分的,为什么说他们缺乏加害意识呢?特别是最近,战争美化论之所以流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战争结束已经55年了,现在的人口中,以不了解战争的残酷和悲惨的年轻人占大多数。而并没有人向这一代人传授正确的历史知识,没有人告诉他们战争的体验和教训。这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的责任。

将战争的历史、包括其发生的原因、基本情况和结果,都完整地讲述给后人,这一工作在日本没有认真地做过。所以那也是历史教育的问题。我长期在大学作教师,多次遇到那样的情况,当我把日本战争的历史事实告诉他们时,许多学生都说是头一次知道,我对那样的情况也很吃惊。包括战争历史在内的现代史部分,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都没有讲过。在学日本史的时候,先从原始、古代开始,等讲到明治维新的时候,一年已经结束了,所以现代的部分就剩下不讲了。

这一情况其实同文部省的文教政策有关系。因为在入大学的统考中,日本史的出题范围长期都是在现代史以外的。在高中是不考历史的,教不教也没有关系,所以就很容易造成那样的情况。在日本史中,现代史的比重不仅很轻,而且日本史还被列为必修课之外,为选修课。显然,文部省的意图就是不希望教授有关侵略战争的历史。所以说,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轻视本国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现象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在日本人中,许多人对于亚洲,特别是近邻的中国、朝鲜有很强的差别意识。本来,无论是文字、学术、文化、宗教,日本都是经过朝鲜半岛从中国学习过来的,所以直到江户时代,只有尊敬中

国的份,没有什么差别意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经济军事急速地近代化,一举超过了在封建制度下停滞的朝鲜和中国。而过早地进入帝国主义行列的日本则把落后了的朝鲜和中国作为获得殖民地的对象。为此,政府有意识地在国民中培植差别意识。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为其培植差别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由于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将朝鲜变为殖民地,把侵略的触角进而指向中国,差别意识进一步扩大。其实这一差别意识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日本对这两个民族怀有的恐惧感。关东大地震时,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残暴的屠杀说明了这一点。之所以发生那样的屠杀,就是由于官员们散布了所谓朝鲜人要暴动的谣言。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抓朝鲜的劳工和慰安妇,对中国人的屠杀和三光政策,都是差别意识的表现。即使到了战后,在日本人的心中,也存在对欧美和对亚洲各国的双重标准。这可以说是战争美化论的背景。

第三,经过战后的50年,日本社会面临巨大的转折时期。在这里必须要注意一种倾向,那就是以修改和平宪法和建立军事大国为目标的政治势力膨胀。进入90年代后,泡沫经济崩溃,危机加剧,社会各方面都呈现紧张状态。而国际贡献论则相当地活跃,他们要求日本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当的政治大国,即应当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中得到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而且,为了参加联合国军,他们要求修改宪法,如果使向海外派兵成为可能,就必须修改宪法。这就是围绕修改宪法和军事大国化的种种言论。

而向这一方向迈进的具体行动,则是最近关于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法案,即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强行通过。在英语中,这被称为“war manual”,这正是战争法案。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对日本安全保障条约的实质性的修改就是一点,即明确了日本参加美国的战争的义务。

为了适应日本这样高度的军事化,必须培植国民,特别是不了

解战争的年轻一代人的军国主义思想。9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编写新历史教科书会的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那些团体竭力进行的所谓的反“自虐史观”的活动，不是美化日本的战争、否认加害行为，又是什么呢？

那样极端美化战争的言论当然不应在日本出现。歪曲和篡改历史事实，像战前的皇国史观那样赞美战争，只是极端的右翼分子的手段。然而，这些年来，被称为学者、评论家的那些人，被认为是财界精英的那些人，居然也无视历史事实，狂热地美化战争，否认加害，甚至冲在前面，这是当前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要特征。

那些美化战争的言论，主要的影响对象是对历史完全无知的青少年。而现在的青少年是没有读书习惯的，是只看漫画而从中获取知识的社会层。所以现在美化战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漫画相当流行。这一点也非常值得注意。

第四，作为社会政治发展的背景，必须指出，目前出现了部分在野党急剧地成为执政党的倾向和其政治态度右倾化的问题。由于渎职腐败事件相继发生，人们对于金钱政治极端不信任，导致自民党在1993年7月的总选举中败北，8月成立了细川的6党联合的非自民党内阁，这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崩溃。但是这并没有成为政治民主发展的契机。前面谈到，由于细川首相8月10日关于侵略战争的讲话引起了波动，右派政治家开始进行反攻。细川首相赶快修正了讲话，把关于战争的认识向右偏了一下。而以自民党的历史研究委员会为首的右倾势力则公然表明了他们的见解。

这一期间，先是细川护熙、羽田孜的非自民党的联合内阁，接着是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的自民、社会 and 先驱党的三党联合内阁的相继的交替，最后在1996年10月的总选举中，自民党终于又实现了单独组阁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各政党分散聚合，民主党、公明党、自由党等都有机会参与组阁，真正意义的在野党只有共产党



和转变为少数党的社民党。

最能表明政治右倾化的就是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关联法案在国会的审议。毫无疑问,这一法案是把日本卷入美国的战争的法案,等于是日美安保条约的修定。所以这一指针对日本国民的命运,对和平宪法的存在都会有重大的影响。但它并没有经过全国性的国民讨论,而只是在自民、自由、公明、民主等政党之间讨论,而那种讨论还不是在国会的公开的场合,而是在饭店、酒店私下进行的。为了使小渊惠三首相访美时带上礼物,该法案于1999年4月27日在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政治右倾化终于结出了果实。

40年前,在日美安保条约修订之际,整个日本的舆论分为两大阵营,沸沸扬扬地进行大辩论。反对修订日美安保条约,反对把日本拖入战争的运动从1959年坚持到1960年,是历史性的高涨。尽管在这样的反对下条约依然修订了,但是这一运动展示的日本国民反对战争的强烈感情,对政界、财界以及美国都有深刻的影响。在那之后,池田等几届内阁都奉行经济高速增长的道路,尽量回避修宪和军事大国化的政策,专心致志地走经济大国的道路。这一次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与那一次相同,或者说这次涉及的问题更重大,但是法案在众议院居然没有什么障碍地顺利通过了。

60年代反对日本安保条约之际,由社会党和工会总评议会建立了阻止安保条约修订国民会议,共产党也参加了,一共组织了23次统一行动。1960年6月15日的展示力量的行动,全国有580万人参加。国会一个月没有开会,结果导致在6月19日夜有33万人包围了国会大厦。同那时相比,现在对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的反对简直是毫无生气,从中明显看出时代的不同。基本是由过去的社会党党员组成的民主党,以及最大的工人团体的工会联合会,都对法案表示了有条件的赞成。40年前,政党和工会以外的团体和组织,如学生和青年组织、妇女团体、文化团体都积极地参

加了运动,使运动如火如荼,而这一次则没有那样的局面。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在以上的4个背景中,改变日本人的战争认识,消除加害事实的倾向也在加剧。历史学依据史料已经搞清楚的问题,即日本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其中南京大屠杀和三光作战,七三一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等等,因为暴露了日本的加害行为,所以都被扣上所谓“自虐史观”、“反日史观”的帽子加以攻击,而对战争则予以肯定和美化。如果这样的历史认识不改变,日本在亚洲就是孤立的,是被轻蔑和憎恶的国家。正确地认识历史事实,对加害的历史进行谢罪,进行正当的赔偿,才能够使日本在亚洲受到尊敬,同亚洲各国亲密相处。

(作者藤原彰,1922年生,日本一桥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 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成立

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于1999年11月15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研究会章程指出:该会的宗旨是促进北京地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任务是开展北京地区及全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活动,协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立北京地区抗日战争文物资料库。会议选举刘大年、白介夫为研究会名誉会长;王桧林、王汝丰、李良志、张注洪、郭德宏为顾问;刘述礼为会长;何仲山、吴广义、张承钧、罗云鹤、罗焕章、章伯锋为副会长;张承钧为秘书长;刘建业、李蓉、林治波、荣维木、徐勇、秦肖娜、魏丕植为副秘书长。白介夫、刘述礼就如何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发表了讲话。